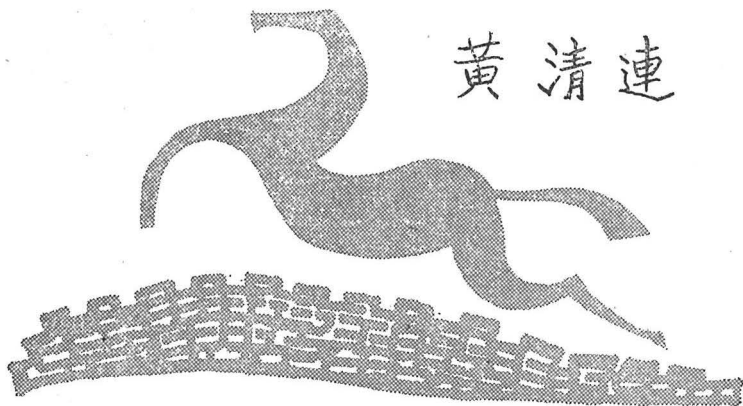


躍馬長城看今朝

黃清連



書名：勒馬長城
著者：逢耀東
出版：言心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六十六年四月

一、江上煙波使人愁

很久以來，我們的祖先就曾徘徊在那一片漠漠平沙的邊緣，對着藍天飄浮的白雲、青青的塞上草發出過聲聲喟嘆。這些喟嘆雖然那麼低微，但透過詩人詞客的筆端，却永遠在我們的腦際盤旋。不但造成中國人特有的「長城心理」，更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。

如果我們也用邊先生那樣的觀察角度，但却不同的眼光，細查繁澗在這一條所謂「沉默的巨龍」上的血和淚，將會發現這種血淚竟和觀劇者的淚眼有幾分相似。因為二千年來，「城外的」遊牧民族和「城裏」的農耕民族的衝突和融合，一直就是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舞台劇。偶爾那個手執利劍、身穿氍毹、頭戴羽翎的「花不花刺」可汗，在鼓鑼喧天與吶喊聲聲

中，也會從幕後闖上舞台，於是台下觀眾蹙眉蹙首，看那不很熟悉的科白，衷心惴惴，希望他早點下台。幸好，這場戲有時並不太長，然後就是那個面容白淨、威武絕倫的漢家天子登場，這時不但奏起清平樂，台下也爆起一陣歡呼，個個鼓掌。

雖然，台下的觀眾有時會義憤填膺、會潸然滴淚，也會輕輕嘆息。然而他們無法更改劇本，不能調換科白。所以，看罷無端的一場紛擾後，只有在日暮時返回鄉關的路上，向對江波，數著點點愁。希望明天，明天該不會這樣吧？

這樣，我們從「城裏」和「城外」的紛擾中，可以發掘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：(一)自從萬里長城出現在中國歷史的地平線以後，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如何？(二)假設這項關係影響到中國歷史發展的話，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，是否可以用「長城」的觀點來解釋？(三)如果「長城歷史觀」成立，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一些特質？

我們欣喜地看到：對於上面三個問題的解答，在遼著「勒馬長城」一書中，已經勾勒出一些輪廓。本書雖然只是作者在巨大歷史潮流中，偶而駐足、「勒馬」後的詩意觀察，但透過作者豐富的國族感情和行雲流水的筆法，一部份中國歷史發展的真相已經得到一些清楚的說明。本書分三輯選錄三類性質不同的作品，第一類是討論有關長城的問題，第二類是環繞魏晉史學作品所作的一系列討論，第三類是關於近代人物及近代史的四篇論文。

本文以下所要評介的是第一輯討論長城的部份，這一輯共選錄五篇文章：「勒馬長城」、「城裏城外」、「長城與中國文學」、「獨留青塚向黃昏——昭君和蕃的分析」、「深宮怨——談談幾塊北魏宮女的墓碑」。作者在這一輯中，大致是以長城的觀點，伸展討論的觸角及於歷史、文學和知識份子的特質和心靈深處。作者用這樣的角度，想要「尋找一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解釋體系」，主要的動機是這樣的：

因為我認為長城是我們民族特有的精神象徵。從兩千年前就存在我們的歷史裏，現在仍然存在着。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長城，對我們祖先所留下的文化遺產，作一個貫穿古今的解釋。（頁二八八，「後記」）

這是作者身爲一個現代中國的史學工作者的歷史嚮往或意願，但以一個擅於散文的文藝工作者來說，作者更把這種「歷史的嚮往」詩意化了，他說：

過去幾年，我一再展開殘卷，馳騁在祖國西北邊疆，會勒馬凝視，想撥開封塵已久的塞上歷史風沙。更懷想當年……在那份失去的詩意激盪裏，尋覓那條用我們祖先的血，塗染成的歷史的線，到底是用多少歷史的點累積連綴的。（頁三）

本文以下的討論，就是要重新撥開「塞上歷史風沙」，檢視這些「歷史的點」，並以前面所提到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爲核心，評介「勒馬長城」一書所提出的歷史解釋。在討論的方法上，筆者希望能以問題的核心爲主要對象，凡屬細微末節只好從略。在討論的態度上，則希望以輕鬆、不拘形式的方式，來處理這些本來具有嚴肅意義的問題。

二、烽火起雲間

在中國古典詩詞裏，我們對於「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」這個課題，不會感到太陌生。譬如：數量宏富的唐詩中，就有不少是所謂「邊塞詩」，李白、杜甫、崔湜、陳子昂等著名唐代詩人，都寫過這類作品。這些歌詠，多半以胡漢關係、邊塞風光、征夫戍卒的血淚和閨門巧婦的怨思爲主題。因此，唐代邊塞詩給人的感受是

壯偉、悲涼和纏綿的。我們不但看到「漢將紛紜攻戰盈、胡寇蕭條幽朔清」的壯偉場面，也聽到無數淒涼的「胡笳十八拍」，更有那如泣如訴的相思。無疑的，這些邊塞詩是詩人敏銳感情的結晶，然而正由於這些結晶是由過多的感情聯綴而成，因而相對地誇張了胡漢之間的衝突與融合、抹殺了歷史上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的真相。

在中國傳統史學作品中，對於邊疆民族的描述，常會抱持「種族中心主義」(ethnocentrism)的觀點，說他們「行盜侵驅，天性固然」，甚至激情地指責他們「貪而好利，被髮左衽，人面獸心。」這種非理性的分析，給後世的史學工作者在重塑歷史真相時，增加許多困擾。他們必須在那麼稀少、有限，而且還具有某種程度的「偏見」的史料中，重新描繪出接近史實的輪廓，的確是比較困難的。

因此，中國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對於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的解釋，實在不盡令人滿意。由於語言的障礙、興趣的限制及其他種種不同客觀因素的影響，半個世紀以來，中國史學的研究，雖然在很多方面獲得豐碩的果實，但在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的討論上，仍然沒有太多的觀點的突破。有一些史學工作者仍陷於若干傳統的窠臼，這是令人十分感嘆的。因為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瞭解，只限於「烽火起雲間」的慘烈層面，或者只在和親、朝貢的詞彙中逡巡，而沒有深究問題的核心，事實上也將會有霧裏觀花的可能。

相對於中國傳統和若干現代史學工作者的論點的，則是近代一些西方和日本學者的立論。他們或說漢族不能與異族和平共處的原因，是蒙古草原地帶的氣候變遷、人口膨脹、貿易受阻等因素的推動，因而每在秋高馬肥之際，游牧民族就會一波一波地湧入塞內，並建立所謂「滲透王朝」(Dynasty of Infiltration)或「征服王朝」(Dynasty of Conquest)。或說漢族不能同化邊疆民族，所謂「漢化」(Sinicization)只是中國人流行的「傳說」或「神話」。檢討這些西方和日本學者的論點，我們雖然不能說他們無中生有，但因他們沒有全盤檢討兩個不同民族在長久時期中的各項關係，因而也不免會有以偏概全的缺陷。

當然，要討論中國歷史上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，必須經過辛勤的史學工作者們一點一滴的去討論、研究，然後才有可能在那麼複雜的史實中，作出抽絲剝繭的結論。在「勒馬長城」一書中，作者就是累積了將近十

年的摸索和追尋，才透過長城來凝視城裏和城外兩種不同生活方式、文化型態的民族，彼此衝突和融合的關係。在本書所輯五篇有關長城討論的文章中，作者不但揚棄了傳統中國史家的「種族中心主義」觀點，也不貿然接受現代西方和日本學者的「大膽假設」，而是懷着「歷史的溫情與敬意」，以豐富的感情作理智的分析，在繁雜、充棟的史籍中整理出頭緒來的。

以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一個課題，也就是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來說，作者的看法大致是這樣的：曾經滲透或征服過中國的邊疆民族，多半來自北方，他們是以長城為界。在城內的是長於種植、善於築城的農業民族，在城外的則是一種遊牧、穿皮毛、吃肉酪、住穹廬的游牧民族（頁二一～二二）。他們的衝突和融合多以長城為接觸的地方，因此對長城的原始意義也有探討的必要。遼先生認為最初長城的築構，沒有受任何外力的影響，而是農業文化自我發展、自我凝聚，經過長久時間累積而成的。然後長城和中國的歷史、文化融合在一起，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象徵。（頁一五）當長城出現以後，城裏和城外的兩個不同民族，由於種種原因，有過衝突的過程。但衝突的最後結果，却是在漢族的血輪中注入新的成份。這樣，我們可以看出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或相處的模式是：（一）異族入侵與漢族守禦，戰爭爆發；（二）如果漢族獲勝，則可能開塞出擊，但仍以長城為文化的防禦線；（三）如果異族突破長城防線，則可能建立異族政權，於是有種族衝突，但異族往往會讓步與妥協，最後成為農業社會忠貞的一員；（四）如果雙方在長城相持不下，則和親、朝貢、通關市，往往成為維持和平的方式。（頁二三，六一等）

細查上述論點，我們發現作者主要是從長城內外的不同民族，在不同時期中所形成的關係的模式來立論。就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漢族與邊疆民族的衝突和融合過程看，這個說法是正確的。因為從東北和塞北進入中原，是邊疆民族入侵的主要根據地。西南邊疆民族事實上極少構成大患，也從未征服或統治過中國。因此，作者透過長城來觀察「夷夏關係」，是符合歷史事實的。同時，作者在檢討長城的意義和功能時，認為：「長城所表現的意義是多方面的，不僅是一條國防線，同時也是條地理的分水嶺，更是分割草原與農業文化的疆界。」

（頁一五）這個說法也有它的根據，從匈奴崛起漠北之後，威脅過漢族的北方邊疆民族，計有羯、鮮卑、氐、羌、柔然（蠕蠕）、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瓦剌、滿洲等，他們多分佈在長城以北、東北或西北，他們在經濟生活、文化模式等方面，與中原的農業漢民族有異，而其分界線也大致以長城為基準。類似於這個說法的西方學者的論點，如賴德懋（Owen Latimore）在「中國的邊疆」（*Inner Asia Frontier of China* 1940, 1962）中談到長城的歷史地理時，主張「長城是絕對邊疆」；又如巴克爾（E. H. Parker）在「韃靼千年史」（*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*, 1924）中認為「長城是一條血線」等。國內的著名邊疆史學者，如已故的姚從吾教授，也屢屢主張應以長城為分界檢討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。本書作者從「城裏」與「城外」的紛擾、從文學表現形式、從漢族政權維護長城防禦線的努力……等方面，觀察長城的歷史意義，並整理出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的模式，不但獲得了寶貴的結論，並且在研究的角度上，也突破了前人的若干窠臼，這是非常可喜的。

三、長城、長城

從「勒馬長城」凝視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，並不是本書作者唯一的目的。事實上，由於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，曾經深深地影響到中國的歷史發展，因此如果能够透過這種關係的樞紐——也就是長城，來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，並從而建立一種「長城歷史觀」（這是筆者杜撰之詞，其說能否成立，詳下），應該才是作者要勒馬長城的目的。在這裏，不妨先看作者怎樣透過「長城」來分析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：

仔細觀察「勒馬長城」一書的主要意旨，可以發現作者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，採取「三階段發展」的解釋。他說：「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，實在曾經經過上古的築城，中古與近古的衛城，近代的拆城三個不同的階段。」（頁五九）這個說法，完整地、清楚地表現在本書第一篇文章「勒馬長城」中。作者以十五頁的

篇幅（頁三～一八），不憚其繁地從「出現在洪水裏的城」、「高原的子民」、「人跨上了馬背」到「十二金人」，就在敘述長城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和它的演變過程。歸納起來，作者的看法大致是這樣的：「從最初第一座城出現於中國歷史，到最後發展成萬里長城，也可以說是中國上古歷史演變發展的過程。為此，我把中國上古史稱為『築城』的歷史。」（頁四）這是農業文化自我發展、凝聚，經過長時期累積而成的。到了草原民族的勢力崛起，並與中原農業漢民族互相抗衡的時候，即使沒有那個偶然闖進歷史的獨夫，萬里長城還是會連綴、樹立起來，成為中國北邊與西北邊的明確邊疆。從此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隔着長城，有過戰爭、和親、貿易、朝貢的過程。對漢族來說，「長城不僅是一條文化的分割線，同時也變成了一條主要的國防線。中國的歷史也隨着進入了『衛城』的時代。」（頁一五）從漢初到近代中國，也就是中古和近古時期，中國歷史「都是農業與草原民族以長城為基線，互相衝突和調和的歷史。」（頁一六）到了近代中國以後，新的夷狄乘船攜炮來自東南海上，橫臥在西北邊境上的長城，失去原有的歷史作用，變為歷史陳跡。這時中國不但有著動亂，也有許多悲劇；在長城環抱裏的千百個小城，為了適應現代化的需要也被拆除，於是中國歷史進入「拆城」階段。（頁一八）

上面所歸納的是作者提出中國歷史發展的三階段理論，這個理論是透過長城的觀點而形成的。在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（或稱「夷夏關係」，Sino-Barbarian relation）的解釋上，很能符合實際情形（詳上節），在其他方面，也能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模式。這些模式，正是作者在本書中所要努力闡明的。現在，讓我們再看作者的這些理論。筆者把它歸納為下列四項：（一）長城的局限：儘管長城的出現，有它許多原始的意義，或是農業文化成熟的象徵，或有防止胡人南下牧馬的目的，或則保衛了中國文化，但更重要的是它「也限制了中國農業文化對域外的發展」。（頁二二）這是因為農業文化必須在固定的土地上發展，使得農業漢民族只注意城裏的家務事，至於域外的事務則漠不關心，所以只要居住在域外的人，不貿然進城擾亂他們的生活秩序，彼此就可和平共存。以上是長城對於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的局限，這種局限表現在很多方面，其中尤以文化的

交流所受到的制約最大。(二)長城心理與中國現代化的悲劇：相應於上述的圍限，是在漢族之中形成「閉關自守」政策，他們不但蔑視夷狄、堅持自己文化優越、拒絕外來的事物，甚至「還有一道無形的長城，橫在人們的心裏。」(頁二四)這種心理，姑且稱爲「長城心理」，它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過程，有極大的影響。因爲當西方近代文明的浪濤擊潰中國知識份子後，他們所餘下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就是中國文物制度超越西方的論調。這種論調，特別強烈表現在清代中葉以來「道」、「器」之爭上。事實上，這種道器之爭正好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腳步，也產生了許多無謂的悲劇。因此，「掀開中國現代化的那層面紗，仍然隱約可以看到長城模糊的影子。」(頁五三)(三)長城的消逝與文化的蛻變與革新：「在中國近代以前，長城的邊界由於草原民族的滲透與征服，曾經兩度被迫消逝。一次在魏晉，一次在兩宋。每次長城邊界被迫消逝的時候，都促成了中國文化的蛻變與革新。所謂文化的蛻變與革新，也就是農業文化經過長久發展以後，產生了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，需要經過一次的重新調整與組合。然後在舊的文化枝椏上，又重新吐出新的綠葉，帶來一樹的清涼，中國的文化又展露了新機。但每次的文化的蛻變與革新，都在動亂痛苦中掙扎好幾百年。然後在這個經過調整與重組的文化基礎上，就會出現一個實踐前代文化理想的新帝國，因此，隋唐實踐了魏晉，明清實踐了兩宋蛻變與革新後的文化理想。」(頁一七)(四)長城與民族文學：由於「一個民族有它特殊的文化風格與歷史環境，一個民族的文學必然受到民族文化與歷史的感染，長城正象徵了中華民族文化與歷史發展的歷程。當然對中國的文學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。」(頁五九)特別是當胡漢衝突，戰爭爆發的時候，中國的古典文學家們在感時憂國的情形下，會藉長城來澆心中塊壘，也會把它看作是鮮血塗抹的血線。有時，他們會把民族的尊嚴和長城融而爲一。(頁六二)這樣，透過長城而產生了民族感情，更因爲民族感情的激揚而影響了文學表現形式。尤其在長城邊界消逝的時候，最爲明顯。(頁六七)譬如王昭君故事之所以有種種不同的說法，就是這個緣故。(頁八三)

以上是作者所提出的中國發展的三階段說和若干模式。檢討起來，這些理論的特點是從長城的觀點來立論，正因爲如此，雖然有些看法在表面上與前人似乎雷同，實際上則不然。譬如：以中國歷史發展的三階段說而

論，由於半個世紀以來，中國歷史學的研究受到歐、美、日本學者的影響，對於國史演進的段落，分期的標準，有頗為詳盡的討論。除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、近世的分期，主旨在教科書編寫與講課方便，可以不論外；以下諸氏都提出過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，如：傅孟真先生在「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」一文中提出「兩型中國說」，雷伯倫氏在「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」中的「中國國史週期演進」之說，梁啟超氏在「中國史敍論」、胡秋原先生在「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」中，都有國史三階段說，姚從吾先生在「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」中提出「中國歷史五大醞釀和四大混合」的說法。這些說法，都有他們不同的着眼點。以與本書作者所提三階段說較為相近的梁、胡二氏而言，梁氏以「世界史」的眼光來討論，胡氏用「文化史」的觀點來觀察，都有可取的地方。本書作者從「長城」的觀點立論，並提出「築城」、「衛城」、「拆城」三階段說，在分期的標準上與前人無一相同，在所斷的時代特色上，則有和前人（尤其是梁、胡二氏）吻合之處。因此，我們可以這樣認定：本書作者以長城歷史觀作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期標準，既和史實相符，與前人說法又可相互發明，那麼它能自成一家之言，也是理所當然的了。

人文科學研究的可貴處，是在於研究者能融會貫通，能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。」就這一點說，作者顯然是成功的。他透過長城的觀點來分割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特色，也說明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特殊模式。從上面所歸納的四項模式看，作者用一個中心思想貫穿了歷史發展的若干層面，使讀者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增加了一項觀察的角度。再以研究的成果與貢獻而論，作者不但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往前邁進一步，更可貴的是能「言人之所未言」。像作者這樣從長城的觀點，來討論文化的局限、國民的性格、文化的蛻變與革新、民族文學的特色等等，確實有他獨到之見。譬如：過去的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時，往往也會分析中國近百年來革新運動所遭致的挫折和阻礙，他們常提出許多不同意見。或說由於傳統束縛過大，或說由於學習洋務只得其皮毛，沒有効其精神，或說主政非人，或說積弊已深，無法遽改。總之，很少像作者一樣從國民或知識分子的性格去探討。因此，作者以由來已久的「長城心理」，作為掀開中國現代化許多悲劇的面紗的基準，

非但不是人云亦云，更能道出問題的關鍵。

四、沉默的巨龍

當然，「長城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每一寸牆基都孕育著華夏民族的智慧和特殊技巧。」（頁五八）一項史觀也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每一個理論都必須孕育著智慧的光芒。在「勒馬長城」裏，我們看到作者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理論，是用「長城」作為支架的。這個支架上，有漢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、有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和模式，它已隱然成爲一個體系，可以進一步來解釋本文第一節所提出的第三個課題——中國歷史文化的一些特質。

在本書中，作者雖然無意特別提出「長城歷史觀」這個名詞，但從他的論點、觀察角度和對象看，無疑的已自成體系，筆者遂以此名之，並試就這個觀點來討論第三個課題。事實上，筆者這項討論只不過是略微撥開一些歷史風沙以後的凝視，無法「據鞍窺古埃，開竈蒸寒雲」，是不免的。

從「長城歷史觀」看中國歷史文化的特質，可以獲得若干新角度的觀察。譬如：中國歷史文化有濃厚的「博大性」，可說人盡皆知。然而，過去的說法多從儒家理論着眼，或謂「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」，或說「用夏變夷」。這些說法本來無誤，只是鼓吹日多日煩，就成老調了。倘使我們能透過「長城歷史觀」探討中華民族是如何形成的，當能發現在長城裏、外的民族是經過長時期的衝突，才逐漸融合的。百川先納涓涓細流，然後再歸於海，只是歷史現象，必須深入這些現象，才能瞭解它的本質。以漢民族的博大性來說，就應該用這種方法去討論。當草原民族一波又一波地越過長城、湧入塞內，並逐步和漢族融合，只能說是一種歷史現象。我們如果能探究這種現象背後隱藏的問題，像征夫戍卒的血淚、詩人詞客的感情、和親貿易的動機、華夷一家的理想……等，才能清晰看出上項問題的本質。其次，應瞭解這個本質的本身具有「複雜性」，它並非一成不變，

也不是數學的加減。因為當長城內外的民族進行接觸和融合時，在兩者文化的內涵上會因調整與重組，從而產生異於本質的變化，這些變化再豐富了原來文化的內涵。以進入長城，並建立過政權的邊疆民族來說，鮮卑、女真和滿族逐步的漢化，但契丹和蒙古則大致上拒絕了中國文明。如果從漢族的角度說，他們也曾由城外的民族那裏，獲得一些新的事物或文明，這些城外的文明經過長久時期的「涵化」(acculturation)後，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。

長城，像一條沉默的巨龍，二千年來就蜿蜒在中國的西北邊疆。它默默地凝視進進出出的民族融合、文化交流，也曾傲笑風霜、瞧盡興亡離合。就中國歷史的發展來說，它具有一定的意義，尤其在近代中國以前，它說明了草原民族和農業民族交往的過程；在近代中國轉變的歷程裏，也有它模糊的影子。因此，「勒馬長城」一書不僅是作者在長城勒馬以後的詩意觀察，也有尋找自己民族的歷史解釋的新嘗試。他連接了一顆顆晶瑩的「歷史的點」而成光彩奪目的「歷史的線」，再用這一條貫穿古今。這樣，他所尋找到的豈僅是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的淒冷、「深宮怨」的哀慕而已！

我們重視您的意見

書評書目雜誌自創刊以來，一直重視讀者的反應和各方面的批評與建議，下期（九月號）是本刊創刊五週年紀念號，我們歡迎您提供各種意見，更希望您成為本刊的撰稿人。